

大学学术权力与 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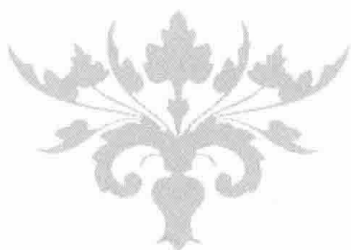
郭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学术权力与 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郭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 郭莉著

· 一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5-21347-2

I. ①大… II. ①郭… III. ①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中国②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G644②G6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146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著 者 郭 莉

责任编辑 纪玉媛

编辑热线 025-83621412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42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1347-2

定 价 7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资 助

2016 年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16HQ022)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生态机理研究：竞争、共生、共轭(2016SJD880076)

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

徐州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

丁三青

郭莉博士的著作《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欣然应允。这部著作是郭莉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益补强而成的。再读她的博士论文及书稿，于我而言，又有了不少新的收获。以下文字与其说是“序”，不如说是我与郭莉的又一次“学术对话”。

在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博士生与导师是“学术伙伴”——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从学术自身来说，“学术伙伴”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更是基于学术探讨的地位上的平等、自由。《礼记·学记》有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中国古代教育尚非今日之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但“教学相长”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原则。博士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形态，最能体现研究性教学。因此，导师与博士生是“学术伙伴”，并且通过研究性教学达到“教学相长”。导师不是“百宝箱”，不是“百科全书”，导师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学术精神的引导、学风的型塑、研究方法的规训，博士生研究的论题往往是导师所不了解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唐代韩愈则进一步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事实上，我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为了能成为“合格的”导师，逼着自己不断学习新知，也从博士生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我在郭莉身上同样学到了许多，包括修业不怠的精神、多学科交叉的视野，等等。

郭莉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优势。她在河海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具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在中国矿业大学读博期间，又在科技与教育管理领域进行管理学、教育学的深耕细作，获管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年轻学者，郭莉的可贵之处是她对学术追求从无厌倦，总是处于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状态。其实，郭莉更珍贵的地方，在于她绝不“死读书”，她把读书学习当作兴趣，在兴趣中不断发现新知和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题域”，学术敏感性很强，特别是在

多种学科交叉地带发现适合自己研究的“领地”。她博士毕业之后,围绕博士期间所研究的“共轭”问题,不仅对博士学位论文不断修改完善,而且发表了多篇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论文,主持了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16HQ022)、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生态机理研究:竞争、共生、共轭》(2016SJD880076),获得了省“青蓝工程”资助、学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形成了自己在管理学、教育学领域“共轭”研究的特色。她还不断“游学”,到美国名校进修,到台湾访学,到江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她自己不仅承担多项省级科研课题,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牵头其中的子课题研究。郭莉目前是她所在高校学院的副院长,是当地政府聘请的应急管理专家,省“青蓝工程”培养对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缘起于我2009年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制度学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2011年承担的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根据郭莉的学科基础、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我将课题交给她,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正如郭莉在学位论文“致谢”中所说,“确立‘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要感谢我的导师丁三青教授的引领。入学之初,有幸受益于老师的精彩讲学,在定期的沙龙活动中,我被共轭原理所吸引”。共轭作为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目前在多个学科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得到应用的理论与方法,在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还没有人进行探索。我的研究算是将共轭应用于教育管理领域的首次尝试。之后,郭莉、刘林等博士生都选择了这一方向,并且在博士毕业后都主持了多项部省级及以上的相关研究课题,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系列研究成果。不过,当初让郭莉选择“共轭”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方向时,我还是有些担心的,正如郭莉在书中所言:“这是我尚未触及过的全新领域,殊不知其中步履的沉重与艰难。”但郭莉以她的韧劲和悟性,较好地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

上面所说的也许与本书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性。但对学术史的梳理、学术历程的回顾恰恰是为了对本书的深刻把握。

下面,就郭莉的这部著作谈一些个人的感想,算是与郭莉的“再一次学术对话”,也是向学界同行的求教。

一是研究视角新,首次将“共轭”引入教育管理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成果不胜枚举,其中,研究中国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成果最为突出。但是,从共轭的视角系统研究中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及其运行机理的,郭莉是首次尝试。2009年我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制度学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算是对中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关系研究的“选题”,我在《中国高等教育》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算是“破题”,而郭莉则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以说,郭莉的这部著作是将“共轭”引入教育管理领域对中国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理的新探索,在学术上具有创新性价值。

作为最早应用于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共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少之又少。但共轭所表达的“对称、平衡、稳定”等自然属性使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是10年前我在申报课题时的想法。我从制度学、组织行为学、共轭原理等角度考察,发现大学组织治理中的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存在“共轭”的关系。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基于大学的基本属性和职能,当代中国大学治理已经不是强调学术力量还是行政力量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点,即二者之间的共轭关系。在此基础上,郭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究。

首先,确立“问题意识”。大学自产生之日起,特别是近代大学出现以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产生了,而这种关系大多是以“冲突”为其表现形态的。郭莉指出:“早期的大学实际上只是学术行会组织。随着大学学科的发展、知识的分化以及大学功能的拓展,大学内部结构也产生了变化,管理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行政权力随之产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且随着大学与社会各方面联系的加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有时甚至表现为激烈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其中,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特别是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持续升温。这一现象与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的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但中国近代的大学学术权力毕竟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外部移植”只是道出

了大学权力产生的过程性特征。实际上,权力的形态、结构及其运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移植过程中,需要关注“本土化”问题。郭莉指出:“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一特色来源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社会特殊发展阶段。研究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既是理顺大学内外部关系的核心(政府与大学、大学与大学、大学内部、大学与社会),也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因此,研究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即在中国的史境下思考中国大学内部权力的产生、结构及其运行。只有这样,对这一问题才能有针对性的把握。”“现实的中国国情下,大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是根本的问题。大学的一切问题包括内部权力结构与运行的问题,必须在这一根本问题之下予以考量。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中国大学存在的历史文化问题(如官本位的历史政治文化),等等。”应该说,上述观点不仅在学理上具有深刻性,而且切合中国大学的客观实际。

其次,带着“问题意识”分析当代中国大学的具体场域。作者循着“深究一点,牵引两线,展现一面”,条分缕析,逐次深究。“一点”就是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关系;“两线”就是分析共轭关系的两条线索,其一是价值的线索,其二是场域的线索;“一面”就是展现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的现实图景。按此理路,郭莉在本书中围绕“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两者的理想状态理应如何”这个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释读有两个方面: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第一,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应然”状态。在此,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有着自身价值、内在逻辑、并具有独立性格的;第二,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实然”状态。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是依赖环境而求生存的变体。对“应然”状态的研究,就是力图透视大学权力特有的、蕴含的特质;而对“实然”状态的考量,则关注大学权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透视深嵌于制度框架之中大学权力的关系,探寻大学内部复杂环境之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互动的意义之所在。郭莉特别指出,在不同的制度中,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的强弱程度不一样,我们不能仅用一种关系来简单地突出它们之间的作用,而是要根据不同条件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是很值得称道的。

再次,对“共轭”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多学科的理解,夯实论题的学理基础。

“轭”，作为驾车时套在牛颈部的人字形器具，被形象地用来表达“系统”“协调”之意。郭莉在前人对“共轭”已有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多学科的阐释。

郭莉认为，“轭”，首先是指其结构、组成、功能及配置上的比例得当、规范合理，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其次，“共”指创造一种“和谐”氛围，使各个共轭要素能配置得当、各司其职；最后，要达到“共轭”、实现“发展”，必须使各要素有机结合和互动。她说，共轭，作为宇宙间的普遍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领域。简单到牛在耕地时所用的工具，复杂到有机化学生物体中轭的共聚合效应；小到量子物理中的微粒效应，大到宇宙间的正反物质，共轭现象无处不在。她相信，从共轭的角度切入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在大学两种主要权力的共轭关系中理解大学的意义。

共轭具有两个重要特性：第一，共轭体系结构相对稳定，要素联系紧密、整体功能协调、对环境适应性强。第二，共轭状态是动态存在的，可以由某种状态进阶到下一个更高层次，追求动态中的平衡。郭莉从制度学、历史学、哲学、管理学等视角对“共轭”进行了分析。

比如，从哲学上来审视。她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本体论意义上的共轭，是指对共轭的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理性”追求，这是就共轭理论体系表达而言的，是共轭理论所要期待揭示的内容，即朝着不依赖于主体而客观存在的“理性”目标，探索与认识主体相区别的共轭的属性、规律或状态，包括共轭的空间构成、历史演进以及功能进化，最终解构共轭并洞察共轭本质，并指向共轭问题的解决。认识论意义上的共轭，是就揭示共轭的本质的意义而言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轭在认识上的反映。认识论意义上的共轭体现了共轭的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对知识构成的反思。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共轭从更新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意蕴，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影响着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变。方法论意义上的共轭，则是运用共轭理论来洞察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用共轭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郭莉指出：“从哲学上审视，‘轭’其实就是一种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有条件的。共轭的三层哲学意义之间的关系好比是‘哲学之树’，分为根、茎、叶：共轭存在是树根，是我们认识的起点；共轭的价值追求是树干，是支持实践生长的条件；共轭的工具性是枝叶，是我们分析的途径。共轭这棵‘意义树’得以生长繁衍不息的土壤就是社会实践。”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深刻而独特的。

比如，从管理学上来审视。她认为，共轭是一种崭新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她说，共轭是一种系统、优化的管理：共轭强调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结

构、组成、功能,其关键在于各对称要素的相互协同与整合,实现“共轭”。要达到这一点,各要素必须相互协调、相互激励、相互合作,以减少内耗,实现组织的有序、和谐的发展目标。注重共轭要素之间的活动协调,必须充分考虑各要素(如资源、行动者、信息等)的整合与优化重组,在和谐运行中共享资源,以充分发挥大学组织系统的整体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价值目标。她说,共轭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将共轭引入管理学领域,就是强调主体的作用,作为管理的主体,都有参与管理的权力,同时作为管理的客体,都要接受上级管理的指导与监督,同时强调管理中主体与客体是相对的,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据此,郭莉总结出在管理学中,共轭的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共轭是一种品质,是组织或系统内秉的;共轭是一种程度,是主体、客体、要素之间表现得恰到好处;共轭是一种结构,共轭要素各司其职、比例得当;共轭是一种匹配,是对称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轭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动态中的平衡。她指出:“共轭在管理学上的应用,充分体现了共轭概念的科学性、辩证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其原理不仅对普遍的管理运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将为大学的管理从战略与策略上引出更新的思路。”她认为,“对共轭的研究,既是一种综合性、交叉性相结合的管理研究,又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运用共轭原理和方法,可以使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入的层次,分析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由于共轭的自然属性及其在哲学、教育学、管理学上的价值,将其引入中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研究,是适切的。郭莉的研究尽管是一种尝试,但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理论上,有助于重新审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从理论上做出对大学内部权力的“真实”理解,拓展了高等教育学、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实践上,运用数据将权力进行量化,展示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系统的“真实图景”,有益于客观把握我国大学权力的运行规则,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二是论证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价值性——目的性与工具性价值价值,观点新颖深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的基本权力关系,这是客观现实,而且由来已久。但很少有人对这两种权力的功能职能即价值性以及两种权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时至今日,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很有必要。因为,要研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对这两种权力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理上的追问和厘清。

有学者认为,大学的行政权力着眼于秩序,而学术权力所着眼的是自由与

解放等人的需求,学术权力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实质性自由与人的发展,通过实质自由去捍卫法权自由。郭莉提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价值分别是自由与秩序,共轭是这两种价值形成必要的张力的结果。她认为,决定大学发展轨迹的,既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学术权力,而是大学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必要的张力是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所构筑的连续统一体(大学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谱系)上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共轭的一种状态。实践中的大学的位置就存在着一系列连续统一的谱系。大学首要的是要确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取向,在“自由”与“秩序”之下的大学才是有“自知之明”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负责”的大学——这种“责—权—义”是大学治理过程中所必须明确的。只有“责—权—义”清晰,才可能实现大学的发展。她进一步说,在“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坐标系”之间的大学实践,并不是对大学之中权力关系的简单图解。大学的这两种主要权力实际上是描述大学权力共轭的两个维度及其张力,任何大学实践都是这两种维度相互作用下的实践。因而,大学实践实际上是这样—个谱系:一端是由学术权力(自由)所构成的、并以此为出发点的教育实践;另一端是以行政权力(秩序)所构成的、并以此为出发点的教育实践;而中间则是自由与秩序的种种共轭的状态而呈现的教育事实。大学实践实际上就是大学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同作用下、在与社会历史情境的相互作用中的社会展开,具体的表现就是大学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适时、适度偏移。其共轭的状态就是一种“最佳逼近”的状态,大学必须做出某种价值选择,其基本价值选择应是自由与秩序。但郭莉同时指出,大学教育实践也并不是像肖尔(Shaul·R)所描绘的“要么……要么……”,大学实践不能囿于这种狭隘的“非此即彼”的“不是而是”式的二元对立逻辑,而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审视大学的权力。这一观点不仅富有思辨性,而且符合现代大学的客观实际。

关于大学行使行政权力的工具性价值——秩序,郭莉认为,大学行使行政权力,在于规范大学的实践活动,即通过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活动,实现大学实践的—稳定、有序。这是工具性价值。大学活动是在—定行政权力的运作下的社会性活动。行政权力不仅表现在为大学学术(包括教学、科研)实践行为划定边界和提供秩序保障,同时还表现为构筑大学的公共精神与个人的社会品性。她说,在行政权力规制之下的大学公共生活中,教师和学生不仅在权力预设范围内自由地发展自身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在公共生活中构筑交往理性,这使他们能共享彼此的价值观。行政权力通过其引导和提倡

的价值,帮助学生形成共同生活的能力。

关于大学行使学术权力的目的性价值——自由,郭莉认为,权力不单是为了大学实践的规范和秩序而存在,从根本上说,追求大学的规范和秩序不是大学制度的目的性价值,只是工具性价值。权力的更高价值在于保障大学的自由,促进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失去了学术自由,大学就失去了精髓。大学需要行政权力,更需要学术权力。但这两者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共轭的状态。

在对大学两种权力行使的价值性进行论证的基础上,郭莉进一步追问: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她的回答是:可持续发展。她说,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命题和挑战,同时也是大学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目标。大学要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应有的“定力”,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坚守自己的理念,这个核心价值和理念只能是“可持续发展”。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中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与实践方式。自由与秩序分别是这两种权力行使的价值性表达,但自由与秩序即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行使各自又有着自己的边界和限度。追求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共轭状态,就是一种对秩序与自由的调和,即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那么,如何调和两种权力抑或如何调和秩序与自由以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郭莉提出,就是要以伦理关怀指导可持续发展,以秩序维护可持续发展,以自由看待可持续发展。关于这方面,郭莉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证,此不赘述。应该说,这些观点不乏新意和深刻性。

三是首次构建了大学场域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和共轭模型,夯实了该论题研究的实证基础。

郭莉指出,共轭机理是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互动的核心。共轭机理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共轭的主体和要素在一系列具体场景中通过多种方式逐渐形成的。因此,必须构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共轭模型,以此作为大学权力共轭的分析框架。

郭莉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场域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放置在一个场域之中,研究在这个物理空间与意义空间的组合与生成中,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所处的位置与所持的立场,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场域资源竞争,履行游戏规则,生成何种习惯,其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资本以及所具有的习惯又是如何影响其行为策略并制约着大学场域结构、影响大学发展的。

郭莉运用法国组织决策分析学派(法兰西组织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克罗齐耶和费埃德博格及其他学者关于“行动者”的概念,将大学学术权力的运作主体及行政权力运作主体看作大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提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并特别强调权力的动态性以及行动者在受制约情况下的自由发挥。

郭莉认为,按照“场域”和“行动者”的理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就是行动者通过不同场域中客观存在的资本力量(学术资源或者行政资源)的相互关系和这些场域中各个行动者之间的象征性权力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行动者又是种种关系的连接点,无论是学术权力的行动者,还是行政权力的行动者都依据其所处的大学场域中的位置、条件、环境、历史等方面,进而具有物质方面有形的多种类型的资本,又具有精神方面无形的影响力。郭莉指出,在大学场域中分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共轭,正是要分析大学场域内部的行动者对各种大学内部的资本(资源)的运用。

由于大学学术资本(资源)、行政资本(资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等特性,据此,郭莉认为,大学场域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的基本性质,就是行动者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资源,彼此之间展开行动,以发挥各自的影响力,达到各自的目的,在对学术资源、行政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逐步占据新的空间场域,形成新的权力关系。

郭莉进一步以弗里德曼“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大学场域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既是“冲突的”,又是“相互依赖的”。正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才构成了两种权力共轭的基础。郭莉认为,相互依赖性是指两个主体、两种权力、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无论是学术权力还是行政权力,离开了哪一方都会失去意义,他们需要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其次,从大学场域来看,由于外部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发展,使得大学必须做出改变。大学已经从简单变为复杂,由单一性变为巨型化。现代的大学已经不可能固守在幽幽象牙塔之内,也不可能默默存活于实验室之中,它必须开放式地面对社会。大学应该植根于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中,学术行动者不可能再像早期那样独立完成大学组织的目标要求,而只能扮演某一种具体角色。第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由于其价值不同、内涵不同、来源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合作、配合与和谐相处的需要。当不同的任务之间相互依赖加强时,相互间的信息沟通、协作与保障行动需要相互调适,而这些又会导致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如果不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不需要相互之间关系的调整就不会存在大

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共轭状态。

在上述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郭莉构建了大学场域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关系的理论表达模型: $[(\text{学术权力})(\text{行政权力})]+ \text{位置} = \text{共轭状态}$ 。郭莉认为,在这个理论模型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实现机理基于“共生—依赖—秩序—稳定”四个有机联系的事实条件在起作用。最后,她得出如下富有创见的观点:(1) 大学场域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是一种自组织现象,共轭过程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通过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作用,能产生稳定的共轭结构。(2) 共轭反映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大学场域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权力行动者必须通过特定的关系,利用全方位的资源,来弥补自身优势的不足,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所以,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共生关系。(3) 共轭的实质是大学场域中各权力之间资源、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互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的核心是资源的互动,共轭的本质是行动者的交往,即大学场域中各权力之间资源、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互关系。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关系随着大学场域内的资源、物质、信息和能量交互关系的消失或加强而丧失或增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形成共轭关系而相互发生关系、相互影响。学术权力有赖于行政权力予以实现,而行政权力离不开学术权力,一方的变化发展必然会影响另一方的变化发展,双方通过彼此的激励、促进作用而相互产生影响。(4) 共轭过程将产生新增能量。在大学场域中,通过权力共轭资源、物质、信息和能量得到更有效配置因而产生整合效应。(5) 共轭过程是大学发展的过程。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过程就是两种权力相互激励与合作中的进化,更有利于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使上述理论能够得到确证,郭莉依据扎根理论,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影响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轭的因素,运用“三角互证”法,建立了影响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 TAR 模型:目标—行动者—资源(Target-Actors-Resources)。在这个模型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的核心是资源的互动,共轭的本质是权力者的交往。她对这个模型的解释是: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其关键因素取决于制度环境、目标、行动者和资源,而内部因素的不同结构,则影响大学的共轭状态,并使大学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面貌。这样,郭莉就夯实了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轭关系研究的实证基础。

四是提出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驱动的策略理路,并分别对我国不同层次的大学分别提出共轭驱动的策略建议。

郭莉通过大量面板数据,对 TAR 模型进行检验,验证了大学权力结构对于大学组织效率的关系。她依据 2002—2011 年“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的数据,研究得出:“985 工程”大学共轭系数为 0.211 476,“211 工程”大学共轭系数为 0.241 447,“一般”大学共轭系数为 1.569 125(现在不提“985”“211”了)。郭莉的研究早于“双一流”提法的出现,所以,书中还沿用“985”“211”的提法)。从中得知,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区间的数值为 0.211 476~0.241 447,如果数值超过 1,行政权力就明显大于学术权力。说明,这类大学的发展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的运作。而共轭数值越小,共轭状态越优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结构越稳定。这几个数值所代表的共轭状况符合中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

据此,郭莉从目标、行动者、资源三个影响共轭的核心因素提出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驱动的策略理路。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我国不同层次的大学提出不同的共轭驱动策略建议,这些都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她首先对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驱动策略进行了理路分析。基于共轭思维,她提出,必须延展大学管理的思维,实现现代大学管理的转变,即从封闭思维变为开放思维,从简单思维变为复杂思维,从静态思维变为动态思维,从冲突思维变为共赢思维。她说,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驱动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的策略系统,是由目标策略、行动者策略、资源策略三个方面构成的。这三个策略构成的系统是一个以共轭驱动为核心的三角形结构。这三个策略决定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共轭的驱动下,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决定了行动者之间交换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推动并保证决策得以贯彻执行的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共轭过程和执行过程中导向、协调、监督和保障方式的选择与实施。共轭驱动最终是为了实现大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随后,她提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驱动的总目标建议。一是在目标策略上,大学的管理者应高度重视目标策略,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并予以实施,在目标实施过程中进行战略管理,协调学术权力系统与行政权力系统的行动者,整合相关的资源,在实现大学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功能的最大化。二是在行动者策略上,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根据法律

规定,大学自主办学,坚持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科学治校。三是在资源策略上,合理配置资源,协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适当干预教育资源配置,实现不同行动者之间在博弈中的利益平衡;不断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促进利益关系的演化。

最后,她提出了不同层次大学共轭驱动的理性安排建议。

“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和“一般”大学这三类不同院校,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状态是不一样的。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受目标、行动者、资源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影响,共轭驱动的策略自然也必须要考虑这三个要素。总体建议中的三个策略是从一般意义上亦即对所有大学而言都必须要采取的策略。但是,由于不同层次的大学在目标定位、行动者、资源方面存在差异性,这不仅决定了不同层次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的程度,更决定了它们共轭策略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这三类大学尽管都在目标、行动者、资源方面采取共轭驱动策略,但每一类型(层次)的大学在具体的策略方面是不一样的。但不管哪种层次的大学,也不管这些大学采取的共轭驱动策略有什么差异,它们共同的职能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其中,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只不过不同层次的大学在对这几项职能的表达上各有侧重,而这同样也决定了不同层次大学共轭驱动策略的差异性。具体来说:

“985工程”高校:目标策略——结合本土实际,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行动者策略——倡导学术至上,强化学术价值取向;资源策略——国际化发展。

“211工程”高校:

目标策略——彰显行业特色,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科技精英,为行业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行动者策略——促进学术与行政系统互动;资源策略——多渠道融资。

“一般”大学:(主要指本科学校,民办大学不在本研究之列):

目标策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行动者策略——提升学术权力;资源策略——地方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上述策略建议符合目前我国高校发展的实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也是系统性很强的实践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又是一个学术研究中的崭新的领域,无论是对其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郭莉的研究仅仅是开了个头。“万事开头难”,一个新论题的探索,总是伴随着不成熟,有

的可能还比较幼稚。本书在实证研究方面还存在着欠缺,对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模型中的共轭要素涉及的环境(制度)因素还缺乏深度思考。这些,都有待作者未来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相信,只要作者坚持探索,勇于思考,一定会呈现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于古彭文昌山下